

文明就在我们脚下的泥土里

——读李姗姗《器成千年》

□ 王 巍



作为一名从事考古工作40余年的考古人，我始终认为，让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理解考古、亲近文明，是我们这代考古人的重要使命。当我翻开李姗姗《器成千年》这部长篇童话时，既惊喜于它对三星堆文明的生动再现，更感动于它以孩童能理解的方式，架起了一座连接古今的桥梁。这部作品以独特的视角、温暖的笔触，将三星堆的神秘，中华文明探源的厚重与多元一体的格局，转化为孩子们能触摸到的故事，是一部向青少年普及考古知识、传承文明基因的佳作。

文明探源的生动解读

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成果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三星堆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、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”。如何让这份“实证”走出学术殿堂，让孩子们理解其价值？《器成千年》给出了答案。

作品以三星堆的核心文物为线索，却没有停留在对文物的简单罗列上，而是通过小泥巴“堆堆”的眼睛，构建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古蜀世界，让孩子们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融。“堆堆”参与祭祀大典时，青铜神树的枝干伸向天空，神鸟栖息于果实之上，蜀王手持金杖的身影在仪式中浮现——这些场景虽经童话化处理，却精准捕捉了三星堆文物的精髓。青铜大面具“双眼突出、大耳舒展”的形象，青铜立人“双手环握中空”的独特姿态，都在故事中自然呈现，让孩子们得以记住这些标志性器物的特征，既保留了学术严谨性，又以童话语言消解了专业壁垒。

更难得的是，作品没有将三星堆孤立看待，



而是暗含了“多元一体”的文明观。“堆堆”在宫殿里偶遇的青铜龙形饰、玉琮，在祭祀坑见到的与中原相似的铜铃、石磬，都是古蜀文明与中原及其他区域文明交流的见证。而当“堆堆”在展厅中看到三星堆文物与其他地区的古代器物隔空相望时，小读者们直观感受到：中华文明是各区域文明像江河汇海般共同造就的。这种认知，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揭示的各区域文明长期交流、相互促进”的结论不谋而合。孩子们在故事中接触到的青铜礼器、玉器仪仗，不仅是古蜀人的创造，更是整个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见证。

以童心视角架起古今桥梁

考古的魅力在于连接过去与现在。考古知识的普及，最难的是找到与孩子的共情点。《器成千年》的高明之处，在于选择了“泥巴”这一最朴素、最贴近孩子生活的意象作为主角。这个看似朴素的设定，却蕴含着深刻的智慧。

小泥人“堆堆”的旅程，是一场关于成长与价值的探索。它从陶器工坊里的一团普通泥巴开始，怀揣着“成器”的梦想，见证了陶器的诞生、青铜器的铸造，最终以承载历史信息的土壤样本身份走进博物馆。陶窑里的盘筑法、青铜作坊里的范铸法，都是以孩子能理解的语言解释了“陶器如何诞生”“青铜器如何铸造”的疑问，把考古报告中枯燥的学术语言转化为具象

的场景。这个过程中，“堆堆”的每一次变身、每一次遇见，都在悄悄告诉孩子们，一件文物的诞生，需要无数次的打磨与尝试。文明的创造始于平凡，就像泥巴可以变成精美的陶器，普通的土壤中也藏着历史的密码。

“堆堆”的“变身能力”可谓神来之

意。书中对考古人情怀与工匠精神的刻画同样动人。修复师面对文物时的专注，队员们为保护一件器物反复推敲方案的执着，为了保护脆弱的文物而设计的吊箱操作法，为了留存每一份信息而对填土进行采集、编号、记录……这些都是三星堆考古团队辛勤工作的浓缩。书中那句“让文物活起来”的朴素愿望，道出了考古人的心声。我们在三星堆的工作，不仅是发掘文物，更是通过这些沉默的器物，让公众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厚重。

三星堆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《器成千年》以童话为桥，让孩子们在欢笑中触摸文明的温度，在好奇中种下探索的种子。读完这本书，孩子们或许更加能够理解，所谓文物，亦是有故事、有温度的“文明使者”，是与我们血脉相连的文明印记。文明不远，就在我们脚下的泥土里，在考古人的手心里，更在每个心怀敬畏与好奇的人心里。

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：让历史活在当下，让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。

（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，一级研究员、历史学部主任）

笔。它能变成青铜小立人、高柄豆，甚至模仿青铜大面具的模样——这种充满童趣的设定，既符合孩子对“变形”的想象，又传递出一个温暖的理念：承载文明的不只是精美的青铜器、玉器，平凡的泥土、普通的器物，每个人的好奇心与探索欲，都是文明传承的一部分。这种视角，让遥远的古蜀文明变得可感可及，也让孩子们更容易与历史产生共鸣。

在童话中定格考古初心与时代气象

作为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的亲历者，《器成千年》对新时代考古技术的呈现和考古人精神的细腻刻画让我特别感动。它没有把考古塑造成浪漫的探险，而是展现了这项事业中科学、严谨与热爱并存的真实面貌。考古不是“寻宝”，而是一场需要科技、耐心与协作的“文明守护之旅”。

作品中，考古大棚里的场景令我倍感亲切：年轻队员穿着防护服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工作，修复师用三维技术还原文物，智慧系统实时监测坑内环境。这些细节绝非虚构，而是我们在三星堆发掘中采用的一系列创新技术，作品还原了新时代考古“科技赋能”的理念和特点。

书中对考古人情怀与工匠精神的刻画同样动人。修复师面对文物时的专注，队员们为保护一件器物反复推敲方案的执着，为了保护脆弱的文物而设计的吊箱操作法，为了留存每一份信息而对填土进行采集、编号、记录……这些都是三星堆考古团队辛勤工作的浓缩。书中那句“让文物活起来”的朴素愿望，道出了考古人的心声。我们在三星堆的工作，不仅是发掘文物，更是通过这些沉默的器物，让公众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厚重。

三星堆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《器成千年》以童话为桥，让孩子们在欢笑中触摸文明的温度，在好奇中种下探索的种子。读完这本书，孩子们或许更加能够理解，所谓文物，亦是有故事、有温度的“文明使者”，是与我们血脉相连的文明印记。文明不远，就在我们脚下的泥土里，在考古人的手心里，更在每个心怀敬畏与好奇的人心里。

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：让历史活在当下，让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。

（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，一级研究员、历史学部主任）

为万物吟唱的歌者

评赵丽宏《月光蟋蟀》

□ 袁晓培



如果将赵丽宏50余年的创作收获谱作一曲浩瀚宏阔的交响，那么，他的散文、诗歌和儿童文学便是交织其中的重要声部。自20世纪80年代起，他就以诗歌和散文的创作蜚声海内外；《火光》《友谊》《江芦的咏叹》等诗篇被广为传诵，《山雨》《望月》《晨昏诺日朗》等散文名篇滋养了几代读者。

十多年前，赵丽宏开始为孩子们写作。首部儿童文学作品《童年河》被评论家刘绪源誉为“儿童文学的意外收获”，静静流淌过百万孩童的心田。之后，他陆续推出《渔童》《黑木头》《树孩》等佳作，为孩子们书写成长与生命的寓言。2024年，童话《月光蟋蟀》问世。作品浸润着作家深厚的个人记忆和传统文化修养，感动了无数读者。

当“序曲”与“尾声”这两个属于音乐的名词，出现在一部童话的叙述中，我便知道，《月光蟋蟀》是作家与古典音乐的深情对望，是一曲与万物生灵的诗意奏鸣。在阅读中，我不断听见贝多芬《月光奏鸣曲》的回响：清冷与温暖交织的旋律，一如书中蟋蟀玉顶和铁头多舛的命运，它们被困于一方陶盆，被人类的欲望左右，却始终心怀对田野与自由的渴望，在绝望中不屈地寻找希望。这不仅是蟋蟀的歌唱，也是生命的抗争。

从“月光下的音乐会”到“蟋蟀猎人来了”，是交响的第一乐章。作家如一位心怀悲悯的作曲家，以清丽、悠长的笔调，谱写出月华倾泻下灵性万物的盛大合奏。青蛙、纺织娘、蝈蝈、金铃子相继登场，草木随风低语，蟋蟀自

由歌唱。文字仿佛被月光浸透，弥漫着草叶与夜露的清香。不过，蟋蟀猎人的脚步打破了这份宁静。从“在花篮里做梦”到“舅舅来讨救兵”，旋律悄然流转，进入第二乐章，作家化身为交响曲的演奏者，将玉顶的命运娓娓道来。它意外被带入人类家庭，虽囿于陶盆，却幸运遇到了温和的小主人和善良的壁虎阿灰。它展现出非凡的格斗天赋，本可安稳度日，直到小主人的舅舅登场……这一部分宛如一段平静的间奏，但在平静之下，暗流早已涌动，预告着一场未知的波澜。

不喜争、不恋战的玉顶被推上命运的擂台，凭智取、巧取险胜了两场格斗比赛，最后一场比赛的对手竟是昔日好友——被蟋蟀猎人抓走的铁头……几场惊险紧张的蟋蟀格斗赛和玉顶、铁头的艰难归家之路，在作家的妙笔下铺陈开来。他变身为交响曲的指挥，从“是走，还是留”到“月光曲，无穷无尽……”挥洒出似疾风席卷骤雨的第三乐章，情绪汹涌，情节跌宕，最终在月光无尽的温柔照拂下，归于深澈而辽远的宁静。

赵丽宏坚信，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是用童真的目光，用生动有趣的故事，不动声色、深入浅出地讲述入世的哲理，引领孩子走向精神的高地。在《月光蟋蟀》的创作中，他有诗人的澎湃激情，调动散文家的绵密深情，以闪亮的笔触，为孩子呈现了喧闹世界中的一方纯净之地。他主张以真诚之心与孩子平等对话，他追求的“纯净”，是回归“万物有灵”的本真境界：不仅是蟋蟀玉顶和铁头，还有甘为朋友断尾的壁虎阿灰以及护送铁头、无畏踏上归家之路的流浪狗黑豹，甚至每一株随风低语的草木、每一只恣意鸣唱的秋虫，都被赋予了尊严与灵魂。

《月光蟋蟀》对万物的深情凝望，其源头可追溯至赵丽宏早年在崇明岛的岁月。彼时，千草堆中彻夜不歇的蟋蟀吟唱，深深慰藉了劳作一天的年轻心灵；月光洒满乡野，也照亮了他最初走向文学的那条小径。那些震颤灵魂的瞬间，历经岁月沉淀，化作文字中的灵气与力量，成为《月光蟋蟀》的土壤。在困境中振翅高歌的蟋蟀，也是作家自身精神的写照。恰如他曾于迷惘困苦中写下的诗歌《火光》中的诗句：“倘若这世上还有清醒的眼睛/火光就定能传达我心中的呼唤。”这种在困境中依然追寻光明的生命姿态，烙印在《月光蟋蟀》的每一个篇章中。

书中反复吟唱的“我在月光下歌唱，我是自由的精灵”，不仅是蟋蟀的宣言，更是赠予每一个孩子的成长箴言；而“勇者胜，智者胜”“我们格斗，是锻炼身体，不是给人取乐”的语句，则在叙事中自然渗透品格与智慧的教育。尤为可贵的是，作家并未提供单一的价值观：蟋蟀猎人的残暴、斑蝥的巧取豪夺、钱庄老板的玩物丧志——这些角色的存在，为童话世界注入了现实的厚度，真实且复杂。小读者们自会寻到光的方向，辨别善恶是非的界限。

或许，在赵丽宏的心里，始终住着一位为万物吟唱的歌者。他以《月光蟋蟀》让我们记住：万物有灵，月光永恒，但生命之声，永不沉寂。

（作者系童书出版人）



富含寓意又治愈心灵

——评诺亚《白夜梦家》

□ 崔昕平



诺亚的幻想儿童文学创作常有能突破思维定式的想象力，有着鲜活的、孩童般的创造力。《白夜梦家》正是这样一部没有束缚、不见套路的童话。青年作家诺亚力图呈现的，是一部既自成一格、又致敬经典的当代“新西游”。

《白夜梦家》起笔于病房，又穿梭于多维空间之中。第一维空间里，医护人员们向一个小女孩许诺：睡一觉，一切都会好。这个女孩恰逢生日，但她没有等来任何亲朋好友。沮丧的女孩在心中默念，不要醒来。当她被唤醒时，进入了第二维空间。这里是现实的校园，女孩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，没有人觉得这很奇怪。没有“存在感”的女孩渴望逃离，忽然听到一颗“北极星”的低沉感叹：“五百年了。”第一维空间里，女孩最喜欢的娃娃是齐天大圣。第二维空间里，女孩被认为500年前的“师父”。由此，故事迅速进入第三维空间。这个空间，是拨动了数代儿童心弦的经典之作《西游记》。诺亚笔下，女孩决定解救北极星。接下来集齐师徒四人组，心怀各自的愿望向北极出发，一路“北游”。北游路上，北极星给没有名字的女孩起名叫“梦家”，女孩在历险中由被遗忘的边缘人一点点找回自信，并逐渐确认了自我。

《白夜梦家》明显具有“后现代”的思想因子，随处可见颠覆、解构、戏仿、拼贴、戏谑。上天入地的想象中，作家还从容地与“现实”、与“当下”打着招呼，为故事赋予生活的气息。比如，压制北极星的魔力符咒，上面的字竟然是“蛋糕八折”。作品中善意的调侃、喜剧性的“梗”无处不在：女孩和北极星是被“海带”和“紫菜”抓到了“龙宫”；师徒预想即将面对威震四海的“龙王”是一只小海马，龙王的三太子是一棵可爱的球藻。收徒北游后，球藻没有变成白龙马，而是变成了一辆自行车。作品以颠覆、解构的方式营造出饱满的喜剧感。

当然，“后现代”思潮影响下的作品往往会以“颠覆”的方式指向虚无，但诺亚的《白夜梦家》背后是饱满的温情和善意。作家的“颠覆”是为了“修复”与“重建”。因此，《白夜梦家》是一部典型的童话，是一部富有寓意的、治愈心灵的童话。面对这个没有存在感的、孤独的小女孩，作家之笔，努力化重病悲伤为轻盈诙谐，摹拟出这个孤独、恐惧的小女孩逐渐找回自信心的心灵成长像。作品在每个人物形象身上赋予寓意。沿途，孤独的女孩收获了被保护的温暖，收获了相互间的牵挂。他们遇到的不敢与人对视的小西瓜，堪称女孩自我的化身，是一个镜像式的角色；他们穿越猫之国，努力不被诱惑迷惑，坚持了“自我”；他们经由镜子国历险变得更加勇敢，并勇敢地给予他人帮助。北极星一角，是曾经的齐天大圣——想象世界中无所不能的护航者，百般迁就的引路人，也可视为女孩父亲的精神化身。作品每章结尾，都有一位陷入沉思的徒弟。这些反转在产生喜剧感的同时，也都暗含隐喻，指向心灵深处的盲从与自我迷失。一路的北行，女孩修复了曾经失去的信任感、安全感，也建立了自信心，找到了属于自我的存在感。

《白夜梦家》在努力走出一条属于当代童话的创作之路，颠覆、解构、戏仿等技法的运用，支撑起作品富有新异气息的幻想空间。作品以天马行空的想象为主要推动力，同时又很注意细节。每个想象的角色，都赋予了言语、动作、心理的细节。同时，作品凸显了对经典作品的巧妙化用与轻盈致敬。作品的主干情节向中国古典文学《西游记》致敬，除此之外，还与《格林童话》里的《灰姑娘》《白雪公主》、安徒生童话里的《坚硬的锡兵》《海的女儿》，刘易斯·卡罗尔的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等都有关联。小读者们可以在阅读中不断邂逅经典童话中的人物或桥段。也因此，《白夜梦家》生动呈现了童话文体的想象之美、情感之美、浪漫之美和创新之美。

（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教授、山西省作协兼职副主席）

“南方”的寓言

——王勇英《狼洞的外婆》读札

□ 曾 钜



了人世间，与他人、与世界交往、相处，逐渐形塑了自身的情感结构。而具体到外婆家的私人空间，则构成了白果新的生存域与认知域。小说试图探索的是白果童年创伤的疗愈，她在陌生的世界中艰难地完成了自我意识的重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狼洞的外婆使白果的人生角色发生了转变，从依靠父母，到与外婆相依为命。当然，这个过程不得不经历层层叠叠的精神磨砺，如此代表着在新的城市空间与生活场域中，白果的心理复原与重建历程。

具体来看，白果首先感受到的是一个真切、饱满、亲爱无比的外婆，“洗发水的气味、香皂的气味，还有狼洞的外婆身上的汗味都混杂在湿润的水汽中。白果喜欢这种气息，在这种气息的包围中，她不慌，也不惊恐。”外婆是她幼小心灵中的“镜像”，由远及近，既陌生又熟悉——白果通过凝视、经验和体悟而确认新的自我。有意味的是，《狼洞的外婆》实际上采取的是外婆和白果的双视角叙事，二者互相观察，外婆作为引导者，令白果的视界转向更广阔的外在世界。由此，白果结识了小伙伴陈三怕，他们一起喂喜鹊、养喜鹊，与喜鹊为友、为伍，亲近自然。“看到白果那么关心疼爱喜鹊，狼洞的外婆心里是欣慰的，白果是有爱心的孩子，她现在能和小鸟成为朋友，以后慢慢地也就敢与别人成为朋友。”喜鹊一家的行迹，外婆、白果与四只喜鹊的交互，都充满了意蕴，一是喜鹊本身的象征意味和它们的习性、情谊，与孩童的爱和趣是同构的。二是呵护、喂养的过程与白果自身的成长互为镜照，“喜鹊们就这样飞来飞去，飞上飞下。白果坐下来，抬头看着它们，笑容在脸上悄然盛开”，彼此之间相互补益与启迪。三是白果与喜鹊建立联系的过程，实际上是在自然万物中，逐渐显影自我主体意识的过程。她了解它们的习性和喜好，也调整与它们的情感和关系，彼此成为对方成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白果为了保护喜鹊，突破了内心的阴影：当她最后走出精神藩篱，走向更多的他者和更远的天地，

便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自我的“养”成。对心智未开的儿童来说，这是一个充满着周旋、角逐而反抗的无比艰难的生命时期。更值一提的是，在“狼洞”这一城市街区，经济关系与生活关系共存，这就使得外婆与租客、顾客与朋友等关系，构成了特定的人情往来及其关联结构。白果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交往与见闻是较为有限的，意味着她打开心扉的过程颇为复杂且艰辛。王勇英细腻描述了白果和喜鹊的共同成长，但人际的交往格局却相对松散且局促，最终打破如是境况的，是故事的最后，喜鹊从白果家飞到三怕家，再到安安家，陆丁家、阿越家，最终串联起了白果的朋友们。这是王勇英的匠心独运，也凸显了南方城市社区中独特的建筑布局和市井生活场景。

在南方城市中平凡无奇的“狼洞二组”，无论是母亲的出租屋还是外婆的顶楼小屋，无论是喜鹊、禾雀等鸟类，还是其中的气候、风俗、人物的性情气质，包括外婆的方言和白果等孩童的语言，都充溢着南方的气韵和质地，或可视为一则“南方”的寓言。小说在白果这个南方女孩身上，探询到了最为内在的动力机制，以源自心灵的实质性衍变，实现了自我的成长与精神的再造。

（作者系《南方文坛》杂志副主编、编审）

